

日本新闻媒体对清末留日学生的报道研究

——以《朝日新闻》为例

王 晓 雨

Japanese Reports on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taking “Asahi Shinbun” as example

WANG Xiaoyu

After the Triple Intervention in 1895, Japan realized that it's necessary to cooperate with China in facing the menace of the western power. Partly because of the Japan's wish to alliance with China, and the China's need to reform, the boom of sending students to Japan started.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also became the subject to be reported in the newspapers.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Japanese newspaper, “Asahi Shinbun”, viewing the reports on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With close review, we would like to discuss the meaning and the effect of studying in Japan in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Keywords: Newspaper, Asahi Shinbun,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关键词：新闻媒体、朝日新闻、留日学生、日清提携

一 “日清提携”背景下的留学派遣

1895年，三国干涉给本来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意识到虽然战胜了清国，但依然无法与列强相抗衡。1897年11月14日，德国占领胶州湾。以此为开端，列强开始加速瓜分中国。另外，虽然中国在甲午战败后撤出朝鲜，但很快引来了俄国的觊觎。而此时的日本显然还暂时未具备和俄国正面冲突的实力，最终被迫于1896年5月14日和俄国签署了《小村-韦贝备忘录》，同意酌量减撤驻朝军队，保有对等驻军权等¹⁾。在与俄国的对峙中，日本朝野“亚洲提携”“中日联盟”的主张再次抬头，进而发展为颇具欺骗性的“保全中国论”²⁾。在此阶段，以“亚洲连带论”为基础，呼吁同为黄种人的亚洲人民携手对

1) 宋成有《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历史的拐点与东亚国际格局》（《日本学刊》，2014年第5期），第22页。

2) 杨栋梁《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一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6页。

抗西方列强成为热门话题。1898年1月，近卫笃磨在《太阳》杂志上发表《同人种同盟 附支那问题研究的必要》，引起了舆论界的关注。近卫指出，东洋发展的前途最终取决于黄白人种间的竞争，而支那人、日本人都是白种人的仇敌，主张通过中日提携来对抗欧美³⁾。1898年4月至9月期间，具有亚洲主义倾向的民间团体、个人及政党倡导“中国保全论”，主张在日本的主导下通过日清提携来抵抗列强的瓜分⁴⁾。

1897年5月，矢野文雄赴北京担任新驻华公使。1897年末，日本参谋本部宇都宫太郎、神尾光臣等人先后来华，游说张之洞⁵⁾、刘坤一⁶⁾等官员，劝说其与日本联合，并建议派遣学生到日本学习武备，表示日本“必优待切教”⁷⁾。在和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等人接触后，张之洞颇为心动，连上三封奏折陈述此事，并力主与日本联合⁸⁾。虽然对于联合日本一事，军机处嘱咐张之洞“断勿轻允”⁹⁾，但从后续来看，张之洞、刘坤一都很快开始着手派遣武备留学一事。翌年5月，作为要求不割让福建的安抚措施，矢野文雄向清政府表示愿意接受留学生并支付相应经费¹⁰⁾。此举虽为矢野擅作主张，但当时恰逢国内维新声浪渐高，留日受到推崇，因此为后来派遣留日学生成为国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些政界人士对留学事业的推动，很可能与前述主张“日清提携”对抗欧美的政治势力有所关联¹¹⁾。

6月15日，军机处传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求催促各省选定学生派遣前往日本留学，正式从国家层面开始推动留日事业的发展。虽然之前张之洞、康有为等人都曾主张经由日本学习西方，但可以看出驻清公使矢野文雄的邀请和承诺，对清政府最终下定决心派遣留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后，尽管受戊戌政变以及义和团运动影响，较大规模的正式派遣直到1901年才得以实现，但以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为首的改革派官僚，为抢夺军事优势，期间一直陆续派遣军事留学生前往日本。1903年，新政改革启动后，随着留日学生在第一次归国留学生考试中被破格提拔，加上国家为了改革需要加大力度鼓励私费留学，留学日本被推向了进一步的高潮。1905年，由于日本出台的《清韩留学生取缔规则》而引发的一系列争端导致留日学生逐渐减少，但也因此实现了从量到质的变迁。由于路近费省等现实因素，日本依然是清末的留学的首选。

与政界人士的推动相呼应，日本教育界也发出了应当协助中国发展教育的声音。1898年8月20日，当时的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田万年在《太阳》发表题为《关于留日学生》的长文，指

3) 狭间直树《初期アジア主義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6) 第五章 東亜会と同文会》(《東亜》，2002年第1期)，第71页。

4) 王美平、宋志勇《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四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8页。

5) 当时任湖广总督。

6) 当时任两江总督。

7) 《鄂督张之洞致总署称日武官力陈联英意见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八(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8) 《湖广总督张之洞来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湖广总督张之洞来电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到)、《湖广总督张之洞来电三》(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十一(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年)

9) 《军机处电寄张之洞谕旨》(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十一。

10) 河村一夫《駐清公使時代の矢野龍溪氏》(《成城文芸》第46号，1967年5月)第68-70页。

11) 桑兵在相关文章中提到：“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和矢野文雄先后向清政府作出同一姿态，绝不会是偶然的巧合。他们的言行显然反映了日本一些政治势力的意愿，而且很可能受到高层的指使，所以敢于如此独断专行。”(参见桑兵《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47页。)

出对清国留学生不应该只交给几个教育家来承担，应将其作为国家事业来对待。他认为清国留学生问题不止关乎学术，更是关乎日本国家利益的大事¹²⁾。由此可见整个日本社会对引进中国留学生的重视。1899年日本前驻华公使大鸟圭介在东京学士院发表题为《对华今夕感情之变迁》的演讲，认为应当认真教导清国留学生，以报答昔日师恩¹³⁾。1900年《中央公论》上发表社论强调清国的发展与日本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我日本国民应将此与人之道，与一国之利害相鉴照，来教育这些留学生，而绝不可以轻视。”¹⁴⁾在日本教育界形成了一股积极协助教育中国学子的呼声。

留学往往被视为两国交流的重要桥梁，是搭建理解与沟通的有效渠道，留学生也常被视为两国友好交流的使者。但如部分研究中指出那样，清末留日学生却多成为之后的反日主力¹⁵⁾。值得注意的是，留日学生作为中国第一批大规模留学海外的学子，同时也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迎接的第一批留学生。“昔日恩师，今日学徒”这一地位的转换，事实上触发的并不只是中国学子的敏感神经。日本政府以及民间人士致力于协助中国发展教育，培养亲日群体，将教育中国学子与国家利益紧密关联。在“日清修好”外壳包装下发展起来的留日事业，随着留学生的不断增加以及该群体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逐渐出现了与日本原来期待不尽相同的发展。围绕留日学生的研究不在少数¹⁶⁾，但综观现有研究，以留日学生为主体视角出发的研究较多，而以日本为镜，反向观察该群体的研究尚在少数。根据笔者的调查，仅有吕顺长的《明治末期日本人の中国人日本留学に対する認識》一文曾做过类似考察¹⁷⁾。但文章中考察的史料主要为杂志而并非报纸。鉴于报纸的时效性更强，阅读群体与杂志也有所不同。因此，本文通过整理和分析甲午战后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朝日新闻》中关于留学生的报道内容，尝试分析当时日本社会对留学生群体的关注点所在。并将媒体对留学生的态度置于两国交往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探究清末留日学生在这一文化交涉场域中呈现出的不同面相。

二 对留日学生的关注与期待

甲午战争被定义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¹⁸⁾。如果说日本获得的胜利被认可为从军事及国家实力上

12) 上田万年《清国の留学生に就きて》（《太陽》第4卷第17号，明治31年8月20日）

13) 大鸟圭介，《清国に対する古今感情の変遷》（《太陽》第5卷第10号，明治31年5月5日）

14) 《清国革新の微光・清国留学生に就て》（《中央公論》，明治32年9月），转引自吕顺长《近代日本人对中国人留学日本的认识》（《世界历史》，2001年第6期），第49页。

15) 如李兆忠《陶晶孙的“东瀛女儿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吕顺长《近代中国人日本留学生的「反日」と「親日」について》（《四天王寺大学紀要》第51号，2001年）中都有类似的说法。

16)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くろしお出版，1960年）；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台湾中央研究院，1975年）；沈殿成《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1896-1996》（辽宁出版社，1997年）等，以及严安生《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識人の軌跡》（岩波書店，1991年）；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酒井顺一郎《清国人日本留学生的言語文化接触：相互誤解の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ひつじ書房，2010年）以及研究论文集《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の現段階》（大里浩秋、孙安石主编，御茶の水書房，2002年）等。

17) 吕顺长《明治末期日本人の中国人日本留学に対する認識》（《日本研究》第18集，1998年9月）第205-215页。

18) 福泽谕吉在1894年7月29日的《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称：“日清の戦争は文野の戦争なり”。（《福泽谕吉全集》第14卷，岩波书店，1961年），但这也是当时日本的普遍舆论。（参见王美平、宋志勇《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四卷，第

战胜了中国。而留学生的派遣，则从文化层面进一步印证了中日两国力量的扭转。甲午战后，尽管日本对中国的看法从“仰慕”转为“蔑视”，“东洋盟主观”崭露头角，但要说感受中国真正的臣服，恐怕没有比大批留学生的到来更为让人感到雀跃的了。

从1895-1911年间出版的《朝日新闻》¹⁹⁾来看，其对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密切关注主要从三个方面呈现：一是密切跟踪报道留学生派遣情况；二是关注留学政策变化；三是关心留学生回国后是否受到重用。

《朝日》第一篇关于留日学生的报道出现在1896年6月9日。文章报道了驻横滨的领事吕贤笙即将带着13名来自宁波、苏州等地的青年到东京学习日语，并将其定义为“官费留学”²⁰⁾。随后，还就其抵达日期、学员年龄及之后具体的学习安排进行了跟踪报道²¹⁾。第二年，这批学生进入日本学校学习时，也做了相应的报道²²⁾。文中对这批学生都直接称呼为“留学生”。虽然对于此行十三人是否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批留日学生，学界仍有争议，但从《朝日》的报道来看，其已将这些学生视为所谓的留学生。此后，随着学习日本声浪的加强，以张之洞、刘坤一为首的地方官员开始派遣学生前往日本。《朝日》始终密切关注着从中国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动向。据笔者粗略统计，从1898年至1911年间，朝日新闻（含地方版）中围绕清国留日学生的报道，仅记录留日学生的籍贯、路程、出发以及抵达日本的相关报道就有93篇，接近总量的五分之一。有些报道甚至事无巨细，对学生从哪里出发，途径哪些城市，何时搭乘上抵日的航船，抵日后选取哪种路线奔赴何处都做了详细的跟踪报道。

另一方面，对于可能阻碍留学事业发展的突发事件新闻媒体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留日派遣正式开始后不久，发生了驻日公使蔡钧的密信事件。《朝日》对该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和跟踪报道。1902年3月中旬，日本政府通过驻上海总领事和驻天津总领事拿到了蔡钧发给清政府外务部的一封密信，信中谈及对派遣留日学生的顾虑，并建议停止派遣的问题。很快，3月28日，《朝日》即披露了该密信²³⁾。文章还特别指出这封密信导致南京格致书院毕业生十数人延期留日。隔日又刊登文章谴责蔡钧作为驻外公使，作如此轻率之言，阻止当下要紧的留学生派遣，实在极为不妥。并呼吁当局者及东洋问题的相关有识之士对其举动多加注意。随着事件的发酵，各大报纸都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涉及外交问题，《朝日》也刊登了蔡钧一方的解释。4月3日，刊载了使馆人员对蔡钧行为的解释，表示蔡公使乃是为了阻止与康梁等有关系的学生被派遣至日本留学，并非为了阻止留学。指出各报纸上刊载的内容有误，以及蔡公使对报道感到不愉快²⁴⁾。4月8日更进一步刊登了蔡钧本人对密信的解释²⁵⁾。表示自身作为公使，最期盼并致力于中日友好，派遣留学生也是自己很推荐的事，今后也将致力于中日亲善。4月14日的报道中更是指责该密信为反对派

14页)

19) 本文主要通过“朝日新聞記事データベース 聞蔵Ⅱ”进行检索，检索范围包括1895-1911年间在东京及大阪出版的《朝日新闻》。以下简称《朝日》。<https://database.asahi.com/index.shtml> (检索时间为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2月28日)

20) 《清国青年留学生》(1896年6月9日)

21) 《清国の本邦留学生》(1896年6月17日)

22) 《在京支那留学生》(1897年7月4日)；《支那留学生に就て》(1897年7月8日)

23) 《蔡公使の密書(留学生の本邦派遣を阻止す)》(1902年3月28日)；《蔡公使の密書(承前)(留学生の本邦派遣を阻止す)》(1902年3月29日)

24) 《密書事件と蔡公使》(1902年4月3日)

25) 《密書事件、清国公使の答弁》(1902年4月8日)

伪造。但同时承认要求驱逐康梁，以及妨害留学生派遣一事为事实²⁶⁾。从蔡钧的解释可以看出，此事经过日本媒体的报道，对其造成了不小的舆论压力。但对蔡氏的解释，《朝日》似乎表现得不太信任，继续对其行为进行了追踪。4月30日，新闻中报道了蔡钧再次向外务省致电，要求设置留学生取缔法严加管束留学生²⁷⁾。5月15日更是再次报道蔡钧的行为阻碍了袁世凯以及大学堂派遣留学计划的实施²⁸⁾。隔日，《朝日》发表题为《变法自强的涂抹》的社论，谴责中国人及清政府因循保守，思想排外²⁹⁾。称在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狼狽之后，清政府虽假意变法，实际上仍顽固保守，对主张新政的有识之士打压弹劾。其中，批评的矛头直指此次因蔡公使密信，外务部致电各省停止派遣留日等行为。该社论将派遣留日与变法自强相关联，用对清政府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批评来谴责其对派遣留日的不支持。指出：“我国希望能保全、扶植、开放清国，诚心追求东亚的和平与发展。”这一论调，与之前日本说服清政府派遣留日的说法一脉相承。

随后不久，发生了成城学校入学事件。而在这一事件中，《朝日》的报道总体上更倾向于站在以吴敬恒为代表的留学生一方——这与之后的留学规则取缔事件中的表现颇有不同。7月1日，《朝日》发表了关于留日学生在神田锦辉馆机会并发表演讲的相关报道³⁰⁾。文章中记述了吴敬恒、戢翼翬的演讲，包括他们对清政府的指责，并记录了在场观众用心倾听，精彩之处满堂喝彩的样子。之后整个事件的发酵过程，《朝日》都进行了跟踪报道。包括留学生与使馆产生的冲突，以及留学生罢课归国等情况³¹⁾。8月19日，《朝日》围绕此事发表社论，指出该事件如果不真正解决导致冲突的问题的话，事件将无法平息³²⁾。文章认为该事件的直接原因是成城学校的入学问题，但要解决该事件，需要蔡公使的反省。指出日本虽顾及体面按蔡公使的意思送走了吴、孙等人，但这也是蔡公使的错误造成的。如果他能说服并制止学生，就不用劳烦警察，也不至于导致所谓的公使馆受辱。并直言北京政府应该对蔡公使追责。直至最后事件得以解决，以及蔡钧卸任，《朝日》都一一进行了报道。可以看出，在成城学校入学事件中《朝日》的报道，基本上站在学生一方，对公使蔡钧的做法多有批评。蔡钧密信事件发生在留日事业刚起步并出现发展势头之时，因此媒体的反应极为强烈。此时，对于中国派遣留学生到日本一事，日本社会仍抱有极大的期待和自豪感。因此任何实质上可能对此造成阻碍的行为，媒体都体现出了明显的谴责态度。而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又恰好发生在密信事件之后不久，《朝日》对蔡氏表现出的不信任态度，以及对留学生入学的支持亦在情理之中。

除了保证留学生派遣通道的通畅，日本媒体还很关注留学生在学成归国后是否能受到重用。毕竟其也并不否认推动留学是为了加强对中国的影响这一目的。早在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发酵的当下，《朝日》就曾发表社论讨论留日学生的前途问题³³⁾。文章中将留美事业的失败归因于学生回国后没有受到重用。提出日本

26) 《公使の密書事件》(1902年4月14日)

27) 《蔡公使の意見》(1902年4月30日)

28) 《留学生派遣中止》(1902年5月15日)

29) 社论《变法自強の塗抹》(1902年5月16日)

30) 《清国留学生の演説》(1902年7月1日)

31) 相关报道有：《清国留学生公使館押寄》(1902年7月30日)；《清国留学生公使館押寄事件》(1902年7月31日)；《清国留学生と清国公使》(1902年8月1日)；《退去清人神戸着》(1902年8月8日)；《退去留学生の保護》(1902年8月9日)；《清国留学生の弁明書》(1902年8月16日)；《清国留学生の帰国》(1902年8月17日)；《清国留学生の面会強請》(1902年8月18日)。

32) 社论《清国公使と留学生》(1902年8月19日)

33) 社论《清国学生の前途》(1902年8月5日)

当局应该照会清政府，要求让留学生能拥有如举人、进士等资格，让其在归国后能有相应的用武之地。恰在文章发表后不久，张之洞拟订新学制，围绕此事，《朝日》再次发表社论讨论清国学制改革与留学生之间的问题³⁴⁾。文章指出新学制将授予新式学堂学生以进士或举人，以此鼓励读书人进入新式学校，表示此举有利于振兴教育。由于中国新式学堂太少，因此应当授予接受了同等教育的人，如留日学生以进士来协助发展新式教育。强调日本为留学生倾尽心力，清国也应相应地优待归国留学生，让其发挥所学知识。但因为科举制度尚未废止，留学生缺少进入传统仕途的路径。呼吁当局开辟一条留学生入仕的道路，希望能加强留日学生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1903年拒俄运动，以《苏报》高揭排满大旗为契机，留学生逐渐从爱国发展为革命³⁵⁾。随着留学生革命情绪的高涨，清政府希望收紧对留日学生的管理。但由于新政的推进，对人才的需求仍然紧迫，因此留日派遣政策的推进方向并未发生改变。因此，张之洞在1903年同时出台了留学生取缔和鼓励留学的政策。《朝日》的报道中也提到了这一问题。1903年，张之洞奉诏后拟订《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1904年十二月间，经学务大臣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八条。根据该章程，学务处与1905年举办了第一次留学毕业生考试，并在同一年七月三日，在保和殿举行廷试。考试结果，分别授金邦平、唐宝锷、曹汝霖、陆宗舆等十四人为进士、举人出身，并授予官职。这次应考的十四人全部为留日毕业生。《朝日》很快对这一考试结果进行了报道³⁶⁾。此次考试中留日学生的破格重用，以及之后科举制度的取消，进一步推动了留日热潮的高涨。但随着留学生，特别是私费留学生的增加，质量变得良莠不齐，加之日俄战争后日本对自身国际地位认识的改变，日本媒体似乎逐渐结束了与留日学生的蜜月期。

三 意料外的反日情绪

推崇留学日本，被提及最多的理由乃是“路近费省”，以及日本学习西方的成果能够让国人事半功倍。可见学习的对象最终是西方而非日本。但如前文所述，《朝日》等新闻媒体将留学日本与清政府变法改革相关联，由此形成了日本协助中国变法图强的印象。两者之间认知的差异，实际上加深了留日学生与日本社会间的矛盾。忍辱求学，是很多学子在踏上赴日旅途时所表达的情绪。到了日本后又时常受到诸如“猪尾巴”之类的嘲笑。身处异国，催生了留学生强烈的国家意识，使其对涉及国家议题的事件表现得极为敏感。

除此之外，随着留日事业的发展，留学生群体也逐渐发生着变化。1903年，清政府放宽对自费留学的限制。并规定自费生只要能考入外国大学者也可转为官费培养。鼓励“自备资斧，出洋留学”，并提出“回国后尤宜破格奖励，立予擢用”³⁷⁾。1905年9月，持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同年7月第一次留学生考试中留日学生被大量破格重用，前往日本求学的学生日益增加，最多时达到近万人之多。其中，出现了两个值得注意的变化。第一，由于留学限制的放宽，留学生素质良莠不齐，部分滥竽充数的学生给日本社会留下了不良的观感。第二，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进一步加剧，留学生中的反清革命情绪逐

34) 社论《清国学制と留学生》(1902年10月1日)

35) 桑兵《孙中山与留日学生及同盟会的成立》(《中山大学学报》，1982年第四期)，第47页。

36) 《日本留学生殿試》(1905年7月11日)；《日本留学生の採用》(1905年7月17日)；《殿試及第の留学生》(1905年7月20日)

37) 张之洞等：《请奖励职官游历游学片》，《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第190-191页。

渐高涨。留学生为开启民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纷纷创办进步刊物进行革命宣传工作³⁸⁾。这两点变化，逐渐在日本新闻媒体上造成了相应的化学反应。

在各种事件的发酵下，中日双方潜藏在对留日事业期待中的矛盾开始显现。1903年3月，在大阪举办的第五届内国劝业博览会上，发生了所谓的“人类馆”事件。《浙江潮》、《游学译编》等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都对该事件进行的义愤填膺的报道，谴责日本对中国人的歧视行为。《大公报》等一些国内报纸也转载了留学生对该事件的报道，谴责日本的不当行为³⁹⁾。这与当初日本招揽中国留学生，期望培养亲日团体的初衷可谓出现了严重的背离。针对这一情况，《朝日》发表社论，提出留日学生在国内发表不少关于日本的负面报道的问题⁴⁰⁾。指出原因在于：第一，留学生国家意识觉醒，变得敏感，容易受到国家体面的刺激，这点需要注意；第二，在我国自由学界的影响下沾染了放纵不羁的风气。表示日本因其留学生身份对其礼遇，但他们却如脱网之鱼，离开之前压抑的环境后，变得过于放纵。目无尊长，蔑视学堂，学会了罢课那一套。提出应该放弃对他们宽容忍让的做法，不要去刺激他们敏感的神经，多提中日情谊，不要让他们在中国全国扩散对日本的反感。从这篇社论中可以看出，留日学生的行为与日本鼓励派遣留学的初衷逐渐出现了分歧。而这一分歧，隐含着之后日本媒体对留日学生态度转变的几个重要观点：首先，留日学生受到歧视，伤害民族自尊的问题。此外，社论中认为日本社会对留学生礼遇也可以看出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因此，在之后发生的取缔规则事件中，指责留学生不受约束，不知感恩的言论，实际上在这篇1903年的社论中已现端倪。最后，文章中提到的放弃宽容忍让，以及多提中日情谊的做法，也极具代表性。这一做法似乎也加剧了留日学生与整个日本社会的背离。

另一方面，面对1903年后留日学生革命情绪的高涨，从《朝日》的态度来看并不支持，甚至认为应该加以管束。一位署名浦门的作者发表《清国留学生的本分》一文，在文章中表示希望留学生不要受过激思想的影响，放言高论⁴¹⁾。作者认为他们和幕末志士类似，可以理解，但要清楚弊害。表示日本人承担教育留学生的职责，要培养其顺良性格以及爱国情怀。翌年7月，该作者在此发表类似文章，认为弘文学院、东亚同文书院的学生违背本分，喜爱议论。认为教导的人不应只一味讨学生欢心，应该更加严厉管教⁴²⁾。

1903年以后，留学生人数进一步增加，加上革命情绪的高涨，给清政府的管理工作带来困难。日本方面也出现了不少标榜速成的“学店”。唐才常事件之后，清政府着手加强对留日学生的管束工作，在鼓励留学的同时，出台了相应的取缔办法。围绕清政府对留日学生的管理政策，《朝日》也进行了相关报道⁴³⁾。此后，速成教育的不良风气进一步蔓延，日本方面也逐渐意识到其造成的危害，希望能加以管制。在此背景下发生了1905年底的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

1905年11月2日，文部省正式颁布《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力图整顿办学秩序，加强管束。实际上，早在7、8月间，《朝日》上就不断地出现要对清国留学生进行管束的相关言论。

38) 根据谷长岭、叶凤美的统计，留日学生是从1900年开始出版期刊的，1907年最多时达到25种。（谷长岭、叶凤美《辛亥革命时期的留日学生期刊》，《留学人员与辛亥革命》，华文出版社，2012年，第98-99页。

39) 《论日本人类馆刻画中国人吸烟缠足情状事》，《大公报》（1902年3月10日）

40) 社论《支那留学生の気風》（1903年6月12日）

41) 浦門《時事所感》（1904年7月25日）

42) 《清国留学生の本来》（1903年10月15日）

43) 《清国留学生の取締に就て》（1903年4月12日）；《清国留学生制限条約》（1903年11月11日）

整个事件中，早稻田大学中国学学者青柳笃恒一共在《朝日》上发表了五篇文章。这五篇文章中青柳态度的变化，笔者认为在整个日本社会对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事件的问题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7月17日，青柳发表第一篇投稿文章《支那学生问题》⁴⁴⁾。文章中指出留日学生给日清关系来带的是利是弊，完全取决于如何教导他们。而速成教育对清国国民教育、两国友好以及东亚发展都没有好处。认为日本应该重视这一问题，不要让留学生事业从益处变成害处。在11月发表的第二篇文章中，青柳依然认为这是日本应该重视的教育问题⁴⁵⁾。但随着留日学生反抗情绪的高涨，以及采取退学等强硬抵抗手段等事态的发展，青柳也好《朝日》也好，态度都逐渐发生了改变。青柳在第三篇文章中就转变了态度，指责留学生拿罢课归国作为利器是无谓的行为，应该对其采取强硬的措施，希望文部省也能下定决心，各学校态度方针也要坚持，以弘扬国威⁴⁶⁾。到了12月24日，青柳发表的第四篇文章中，态度则更为强硬，表示如果此次过于纵容留学生，那么日本吸引留日的事业也会失去意义⁴⁷⁾。这与12月《朝日》发表的两篇关于该问题的社论的论调基本上是一致的⁴⁸⁾。这种认为留学生过于任性放纵，日本政府应该采取强硬态度对其进行管束的主张，直到后来事件趋向平息，留学生计划返回日本复课，才趋于缓和。青柳的第五篇文章正是发表在这一时期。文章对留学生愿意回来复课表示高兴，并建议其专心学业。但仍不忘建议教育部门恩威并施，加以管教⁴⁹⁾。

在经历了留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事件之后，日本对于通过留学培养亲日群体的幻想可谓几乎破灭。日本媒体也彻底结束了与留日学生的蜜月期，报道倾向也随之发生改变。在此后的报道中，一方面因为留学生数量的减少，一方面因为媒体热情的降低，围绕留学生抵达日本求学的行程报道逐渐减少，报道内容则多见于对留学生不良品行的报道⁵⁰⁾。

四 “日清修好”的理想与现实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对于在近代化进程上停滞不前的中国逐渐产生意识上的变化。陆奥宗光曾指出中日两国的争端“不论外表上出于何种形式，其原因必然是西欧新文明关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⁵¹⁾。甲午战争在舆论上也是被定为为文野之战，在媒体上向国民灌输“文野之战”、“义战”的意识⁵²⁾。战争的胜利自然成为了文明之国的胜利。因此，同作为亚洲一员，带领未脱离野蛮的中国走向文明更加强了日本自身的自信。或者换句话说，成为中国的“老师”，也同时可以证明自身的文明与希望。

日本社会对于留学生派遣的热忱，有基于精神与实务两个层面的原因。精神面上有作为亚洲文明先行

44) 《支那留学生問題》(1905年7月17日)

45) 《再び支那留学生問題に就て》(1905年11月12日)；《再び支那留学生問題に就て(続)》(1905年11月13日)

46) 《三たび支那留学生問題に就て》(1905年12月8日)

47) 《四たび支那留学生問題に就て》(1905年12月24日)

48) 社论《支那学生問題》(1905年12月12日)；社论《支那学生問題(再び)》(1905年12月26日)

49) 《五たび支那留学生問題に就て》(1905年12月31日)

50) 该类报道如：《清国留学生の腐敗》(1906年3月28日)；《醜体至極の清国学生》(1906年7月3日)；《清国留学生の称号売買》(1907年6月1日)；《清国留学生集会の紛擾》(1908年5月11日)；《怪しからぬ留学生》(1909年5月9日)等。

51) 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7-28页。

52) 杨栋梁《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第一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6页。

者的所谓“自负”或“责任感”。实务层面上则是期待透过接收留学生扩大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但这两个原因看似一石二鸟，在实际操作上却有相互矛盾之处。甲午战争既然被定位为“文野之战”，那么作为战胜国的文明国日本，也被赋予了带领野蛮之中国走向文明的正当性。但此种正当性，是以进化论为内核，对文化进行高低序列作为前提。而甲午战争时期对“文野之战”的普遍宣传已成功将此概念深植入整个日本社会之中。中国既是“野蛮”之国，前来学习的中国人自然也是“野蛮”之人。同盟与合作的理想，并不能阻止这种优越的心态渗出于言表。而这只会加倍刺痛这些渡海求学的留学生本就因民族危亡而焦虑、敏感的神经。

上述的文化环境，导致了原本充满期待与理想的留学事业，最后发展到事与愿违的地步。从前述的蔡钧密信事件可以看出，日本舆论界对待留日一事，是以一个文明引领者的身分，交杂了培养亲日群体的意图——事实上，他们也并没有特别去掩盖这种意图。这在矢野文雄的策略，及大隈重信的对华意识中都有清晰的体现⁵³⁾。其中，也难免存在对落后中国的鄙夷之情。而只身来到日本的留学生们，除了部分政治家以及教育家的高远情怀，他们生活、接触的是真实的日本社会。只有身在其中方能有所体察的细微想法，毫不意外的引发了留学生的民族情怀和对抗意识。其实单就思想启蒙的角度上讲，这种心情上的“刺痛”与不适，对中国人来说未必是件坏事，但带来的结果却绝不是日方原先所预期的。特别是1904年抵制美货的事件已经引起了日本的警惕，留日学生刊物中对于日本的批评更加深了他们的忧虑。直到取缔规则事件的爆发，之前暗流涌动的不满达到了临界的突破口，终于引发双方大规模的相互责难。

持平而论，即使是作为先进国，也没有在“文明”经验的分享上无偿付出的责任。但即使政府菁英们有其政治盘算，作为一般民众，心理上至少希望换来一番感恩。但在留学事业中所看到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引发日本社会上两种全然相反的思考：一方谴责这些留学生心非良善，忘恩负义，认为其愚钝不可教。另一方则是对自身作法提出反躬自省的呼吁。这些日本社会中所存在的不同的声音和看法，在报刊的一篇篇或义愤填膺、或大义凛然的文字中都被保存了下来。而这便是报刊史料的迷人之处。

解读近代日本的中国观时，学者、名家等具代表性的菁英观点是很难忽视的。特别是这些发光发热、大鸣大放的舆论领袖们经常引领了社会议题的风向与变化。但这些庙堂之上的观点与思想，如何透过大众传媒，对广大的社会阶层进行观念性的“下沉”，则是下一个阶段的重要议题。大众传媒的报道，不仅更能反映出普遍、日常的一般观点，也能看到日本社会中所存在不同群体的多元议论。基于以上，本文以《朝日新闻》中对留日学生的舆论报导为例，梳理、探讨了日本社会对于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印象及其变化。从中我们看到日本社会与作为“他者”的中国留学生之间，在理想与冲突、思虑与情感之间所触发的各种关于文化交涉的现象与问题。

53) 野村浩一曾指出，大隈重信所主张的“东西文明融合”实际上是“完全模仿西方的方式来向中国渗透”，而这种做法是大隈“难以隐瞒的虚伪与伪善”。（《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走向亚洲的航迹》，张学锋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